

編後語

無疑，2005年是兩岸互動相當活躍的一年，而回歸數年的港、澳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關係也日益緊密。本期「港澳台的政治與身份認同」三篇評論文章，正是對當今港澳台在複雜的政治和文化衝突中如何自處的細緻描繪和闡釋。蕭高彥剖析台灣自民主化以來憲政秩序的頻繁變革如何引導着國家認同的重構，進而揭示出各種紛繁複雜政治路線變遷背後的意識形態預設，並試圖對台灣民主化實踐做出理論概括。鄭宏泰、黃紹倫論述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自我身份承認」和「別人承認」的相互衝擊和影響，強調政府發揮的作用；文章對身份證和回鄉證的巧妙分析肯定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與以上兩文相比，黎熙元的工作似乎更困難一些，因為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更加「難以表述」。正如該文指出的那樣：「在殖民時期的澳門，中葡兩個國家政治力量的影響經常處於均勢，由此產生了華洋分治、集團壟斷和社群隔離的特殊歷史。在此過程中『澳門故事』是分別由中葡兩國以自己的官方政治、文化話語來敘述的，澳門人只能在其中選擇可接受的版本。」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為甚麼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和澳門存在如此明顯的政治文化差異。無論是台灣的民主實踐、香港法治和文官系統的有效治理，還是澳門的文化融合，都應得到充分的理解、尊重和反思，並被繼承、吸收，成為我們民族在二十一世紀發展的共同經驗和資源。

張鳴和胡其柱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三反五反」運動。張鳴認為，中共立國之初厲行國家資本主義，致使「私營資本的權力尋租和國家統制對市場經濟的戕害等問題很快就暴露了出來」，中共發起「三反五反」運動正是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而胡其柱則認為這場運動最強烈的政治含義在於中共放棄了其在勞資之間的「超然」地位，「兌現意識形態給予工人的許諾」，迫使資本家階級淪為社會邊緣群體。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與市場、政府與企業家的關係還很不穩定，經濟倫理的衝突也依然是社會問題的一個基本根源，因此，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和總結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此外，周其明尖銳地批評《選舉法》在2004年的若干新修改，他認為這些敷衍了事的修改，既不能解決原來的根本問題，也沒有充分回應選舉實踐中產生的新訴求；張春明考察獨立後印度中產階級的習性，揭示這個曾經被給予很大期望的階層如何「退縮狹隘」，又如何「在奢華消費中陷入『孤島』」，值得我們深思、警惕。

此外，本期王柯、楊劍龍、伍小濤三篇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中國宗教問題的文章，讀來也饒有趣味。尤其是王柯和楊劍龍的文章，他們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個案中都強調了中國文化對於宗教信仰的寬容和令人驚奇的、堅韌的滲透力量。這種力量是我們今天依然可以訴求的精神資源。

11月20日是胡耀邦先生九十冥誕。耀邦先生的寬容精神和人道立場給中國的政治文化增添了一種恢弘、從容的氣象，對於各種社會衝突日漸加劇的中國而言，耀邦先生的政治品質和政治理想尤其令人懷念。本期「隨筆·觀察」何家棟、王思睿及嚴平兩篇文章，表達了作者、也是編者對這位中共歷史上最開明的領導人的哀思和敬意。